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作者：陈君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所提倡的“中国中心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尽管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对于克服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弊端，具有重要的意义。

The China-centered approach, advocated by Paul A. Cohen in his work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is not only a problem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ut a deep one in historiography. Albeit with flaws, it is still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vercoming American Westcenterism defect in their Chinese history study.

美国卫斯里学院历史学教授柯文(Paul A. Cohen)所著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出版后，在国内外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学术界围绕书中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或译“中国中心取向”)的方法论意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对蕴藏于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却未能作更进一步的剖析。^①(注：有关这方面的评论主要有：M. Gasster认为，“中国中心观”提出了“我们应发展什么样的分析工具来调和中国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见M. Gasster“*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Some Comments on Paul Cohen'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Summer 1987), 5.2:151。侯且岸认为：“高度评价‘中国中心观’的学术价值，主要肯定这一理论取向在现代中国学发展史上的理论批判作用和方法论意义。”(《当代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罗荣渠指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主要是“国外学术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论的评述”(《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为了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另辟蹊径，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对“中国中心观”理论实质的剖析上，认为“中国中心观”集中反映了柯文试图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性”是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理念的执著追求。虽然，它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毕竟给“西方中心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

一 柯文对“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理论的批判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战后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某些主要取向“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1](p1)。全书共四章，其中有三章分别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及“帝国主义论”三种研究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只是在最后一章才正面阐述其倡导的“中国中心观”。虽然，柯文的批判是逐一进行的，但斗争的锋芒却集中指向“传统”与“现代”(“近代”与“现代”在英文中皆为modern，对这两概念的适用范围，学术界有争论，本文系同义)两极对立的理论。

柯文认为，“传统”与“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用它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简单化。他指出：将“传统”等同于“落后”、“现代”等同于“先进”会导致历史研究的简单化，因为“传统”、“现代”之类的概念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封闭式的概念”，用这种封闭式的研究模式进行历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地强迫我们削足适履，让史料迎合预先形成的理论框架”[1](p80)。例如，“冲击—回应”模式由于集中探讨了预先设定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较早地更有力地对外国侵略作出回应?这就很容易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而忽视了某些重要事变；“传统—近代”模式因排除了人类经验中某些极为重要的领域，只是因为一时无法认定它们到底是属于“传统的”还是“近代的”，迫使史家对历史和现实采取严格的两极划分法；而“帝国主义论”则把帝国主义的西方当做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的决定力量和把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西方。因此，这种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就把未现代化的国家丰富多彩的历史景象变成了十分单一的历史画面，它蕴含着单线进化的目的论。具体地说，史家如果按照“冲击—回应”、“传统—近代”或“帝国主义论”模式，势必主要只选择那些不是促进就是阻碍“进步”、“发展”、“近代化”与“革命”的历史侧面。

概言之，这三个模式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正如一切带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的取向那样，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循环推理，因为它们最后在庞大的历史现实中所发现的现象恰恰就是它们一开始就要寻找的现象”[1](p5)。因此，历史学家要从这种笼统地把历史现象归类为“传统”与“现代”的封闭模式中解放出来，必须采取更开放的形式。只有采用开放式的变化模式，辅之以开放式的问题，才能勾画出一幅对历史事实比较敏感的“中国近世史”的画面。

应当指出，战后美国中国史学界虽然在术语的运用上，经过一番清理，与其前辈相比更中立些，但总的来说，他们与19世纪的前辈一样“继续按照各民族靠西方社会，特别是靠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程度来评定这些民族的进步”[2]。他们把西方安排为

主动的(active)角色, 中国则扮演远为消极的或者说是反应的(reactive)角色。李文森曾明确地说: “随着中国的工业化, 中国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 势必变得越来越模糊”, 通过工业化带来的改革社会的作用, 中国社会将变成“和近代 西方社会异常相似的社会”。[3] 这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研究取向, 明显地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柯文认为, 美国中国史研究存在的这种夸大西方作用的错误倾向, 主要是由美国人研究中国时所采取的思想模式造成的, 它的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第一批进入近代的人, 以为对近代的了解已着先鞭, 于是就自然地倾向于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 并为此创造了一整套知识, 集中研究他们发明的、被称为东方的现象, 从而使他们的研究在“一切智力上的探讨、一切求知的过程, 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1](p132)。例如, 李文森把西方文化视为作用于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种溶剂或楷模, 并从这种观点出发, 认定中国必然自始至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这实际上给西方安排了一个令人惊愕的角色: “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 它“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1](p57-58)

总之, 在柯文看来,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要取向, 虽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同, 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 有相似或相同的看法, 即采用早期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概念, 叙述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化的历史。正是这种近代化理论两极划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近代化理论其他更加复杂详尽的形式), 对中国的中国史专家有很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使他们都错误地描绘了西方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充当的角色, 同时也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其结果是导致了“绝大部分学术研究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挑战与中国应战的思路加以处理, 就是按照‘近代化’——由西方带入并由西方界说的‘近代化’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加以处理”[1](p2)。因此, 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必须超越这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范畴。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二 超越“传统与现代性”

柯文对“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理论的批判, 是基于他对历史独特性的执著追求。战后美国史家由于思想上的狭隘主义, 使他们把目光局限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 并因此形成了以西方为“典范”的历史发展目的论。这是产生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柯文反对这种狭隘主义和目的论, 深信不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 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 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需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 单独设计, 否则必将限制、遮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 而以前的三个模式正是由于设定了预先的研究框架, 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的历史现实。因此, 他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 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 去发现历史。

1. 在“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

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中国的“主体性”尊重不够。所谓主体性主要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 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 自主、独立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西方学者在研究其自身社会变迁和现代性时能表现出对自己主体性的全部尊重, 而对西方以外国家的主体性则缺乏应有的敬意, 并进而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其结果往往是造成研究的历史被扭曲。柯文认为, 美国中国近世史的研究要改变这一现象, 做到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 必需“不仅把这段历史应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 而且也应视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1](p3)。

为此, 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专门就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思想来源, 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 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 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这些改革家倡导改革的思想根源。例如: 王韬是19世纪70、80年代标准的西方问题专家, 力主按西方方向进行改革, 可是他在60年代初期以社会、政治批评家与改革家身份初露头角时, 并不是对西方而是对太平天国作出回应; 梁启超, 虽然是清末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 但是他的整个思想则受传统的经世思想之影响。因此, 不论从中国国内的思想背景着眼, 或从引起部分改革的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问题着眼, 只要从中国内部的传统来观察19世纪改革运动, 都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不相同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 “西方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但对这种地位的理解, 要比以前复杂得多, 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和西方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被动的中国, 而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 一个充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1](p142)。

我们说,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它只能从既有的传统出发, 根据新的社会条件进行自我扬弃, 并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配置, 经过两种文化相斥相纳的涵化过程, 逐渐导向新文化的诞生。也正因为如此, 每个国家的现代化, 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 有自己的模式, 而不能照搬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 摆脱西方中心史观的束缚, 在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 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

2. 在复杂的历史中, 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两极理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 忽视了两者之间动态的连续。其最大的特征是只看到符合西方规范的一些价值和结构, 而低估传统社会中某些潜在的“现代”因素, 把“传统”与“现代”视作是两个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体系。针对这种忽视历史连续性的做法, 美国中国史学界, 早在6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人起来反对。史华慈(B. Schwartz)在批判李文森对文化的有机或整体性看法时, 就强调指出: “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 不论有益有害, 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 “中国之‘过去’和‘现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4]

与这些学者一样，柯文同样注重历史的连续性，立足于发掘中国本身的历史，而不是用西方的价值观，而是通过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个性来发现其自身的历史。但柯文在这方面的认识比他们要更进一步。他指出，这些史家虽注意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认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从“传统—现代”这个单一连续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联系性上还是不够的。他说：“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定义明确的社会文化标志，有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特质，而‘转换’则被视为联系二者的桥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僵化机械。它忽略了‘转换’是人类历史从来就有的特点。它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5] (p82)可见，在柯文的思想中，人类的经验里还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超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近代文明”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其中一些被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其发展的方向未必必要与西方式的“现代”同一，它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它们自身的特质，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因此，史家不仅要看到传统与现代间的连续，而且还要超越固有观念上“传统”与“现代”这对概念的束缚，在复杂的史境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3. 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术语。

美国中国史学界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他们虽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连续，也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思想文化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但在具体历史的叙述和分析中，却常常套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学术规范。最为典型的是，一些学者试图借用西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来建构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提出中国在前近代虽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但在19世纪末期，已经发展出类似欧洲资产阶级出现时特有的一些“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现象。^①(注：其代表作有：Mary B.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Stanford 1981); William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1984);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1989)等。)

柯文认为，这是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它说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在超越了视中国自身无力创造现代社会这一偏见后，又在无意中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历史学家要从“囚禁在自己的近代经验的狭隘牢笼中”解放出来，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根本放弃近代化理论的整套术语(特别是‘传统’与‘近代’的概念)，寻求另外一种西方中心较少的方法”，来描绘中国的近世史。[1] (p81)正鉴于此，柯文在书中采用“近世”(recent)来统称19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不是“近代”一词。他解释说：“我对研究中国史时采用‘近代’一词深感不妥，即使作为纯粹的用词，也是如此。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宁可使用诸如‘近世’一词或者‘1800年后’这类词语。”[1] (p2)

综上所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集中反映了他对于超越西方所界说的“现代性”是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理念的执著追求。也正是由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有了这些全新的概念和看法，强调了“传统”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突出了中国史研究中中国的历史主体地位，才使他倾心于从中国的内部“传统”来考察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传统与现代性”是柯文中国史观的理论出发点和实质之所在。

三 “中国中心观”的内在矛盾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总是抱着某种固定的偏见。他们完全忽视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路径及其特点，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正是非西方国家将要走的道路。相对于这种历史观，柯文的中国史观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他针对西方中心史观的流弊，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主张从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的特质出发探索历史发展的进程，对美国中国史研究起了真正的思想解放作用。

但是，由于历史观和历史视野的限制，柯文未能科学地把握住“传统”与“现代”这对关系，过分强调内部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结果导致了“中国中心观”内在逻辑的紧张。

应当肯定，中国早在西方到来之前已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向。宋代出现重大的技术进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努力开拓向海洋的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经济日益货币化等现象，都可以被一些史家用来说明中国早在西力东渐之前就已经有了向“现代”社会转型趋势的依据。但这些变化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使中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传统结构外壳，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古老的中国正是由于鸦片战争才让西方列强撞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蜂拥而入，从而加剧了中国社会离异传统的趋向。这种趋向和清王朝内部衰败的过程相交汇，使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了长达百年之久落后挨打的局面。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文强调史家应采取“内部取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嬗变，固然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内部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的运动在社会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但却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

对于上述的评价，柯文尽可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中心观”不否认外来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相反，它所采用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来因素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它与以前几种研究模式相比只是“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从而“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点进行探讨”[1] (p175)。

那么，柯文所说的“更有效地”分析外来因素在中国特殊表现的涵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柯文1974年所著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曾把沿海和内陆的差异作为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在深受西方人影响的沿海城市及其周围，逐渐发展出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西方文化。这一文化与代表传统的内地文化截然不同，“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而且，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还对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地构成了挑战。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沿海不断冲击内陆，内陆则试图通过中国化使这种冲击合法化的历史。质言之，“沿海承担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责任，内地则使变革合法化”[5] (p219)。

当然，对于此著所阐述的许多观点，柯文后来并不满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20年过去后，他仍对沿海和内陆之说情有独钟。1992年，他在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称：“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陆的两分法，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5] (p2-3)

可见，柯文所讲的不否认外来因素的作用，并不是说他已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做是一个内外因相互交织，辩证互动的结果，他只是通过范围的限定来看待“西方”对中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证明中国中心观的有效性。他指出，如何评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最好的办法是把19世纪中国历史分成若干个不同层带(zone)：最外层带、中间地带和最内层带。西方的“冲击”主要适用于最外层带——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的海关、兵工厂、船坞、留学生、使节等事物，而对最内层带，诸如语言书法，宗教与审美、农村生活方式与风格等则不适用，因为最内层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与社会侧面，“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1] (p40-42)。

柯文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反映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种内在矛盾性。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为此，他在阐述“中国中心观”时，曾一再强调“不是认为西方的实际历史作用不重要”，并申言这一概念构架的目的仅仅是“最大程度地解释历史”，“尽可能少地扭曲历史”。[6]但实际上，柯文采取的却是历史相对主义的做法。

历史相对主义倾向是柯文中国史观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这在他的新著《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该著中，他一方面相信过去对于现实的影响是存在的，认为历史学家作为“现实与过去的一个媒介”，只要他们“不停地、灵敏地和尽可能地诚实”，是能够使过去和现实“在一定范围内能进行有益的交流”。因此，历史学家要致力于追寻历史和历史研究的独特性，立足中国的内部传统，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但另一方面，他又持历史真理的相对主义观点，认为过去事实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学家对这个过去的事实最终是无法理解、无法探知的。因此，历史学家惟一可行的，就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在“各自的层面”“各自的范畴内承认其价值”，并作出自己的解释。[7]这种相对主义的做法，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本身，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顿挫了他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锋芒，使他最终未能实现超越的目的。

四 余论

柯文的中国史观建立在对美国中国史学界“两极理论”系统批判的基础上，其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也是围绕传统与现代性这一根本问题展开的。他试图超越这对范畴，彻底解构西方过去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学术范式，从“殖民地史”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联系到中国历史的具体实践，就是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现历史。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既是一个史学方法问题，又是一个深层次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要真正把握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走向及其学术价值，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后者更有意义。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跨越文化和政治疆界。换句话说，就是在西方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哺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研究另一种迥异于己的历史文化时，怎样超越自身的思想局限。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吸引了美国中国史学界最有天分、训练最好的史学工作者，但他们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化叙事”中。他们依据西方式“现代化”的尺度对中国的过去作了“正面”或“负面”的解读。这种曾影响整整几代人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化的主要阻碍因素。虽然，他们有时也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作用，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内部因素仅仅只是对西方“冲击”作出消极、被动的反应。

而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则与之相反，它的核心概念是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柯文认为，传统中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事态和其展开过程，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力量会不断地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所以，研究者必须从特定的历史实际出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而不是把它看成是“西方历史之实际或理论上的延续”[1] (p7)。

我们说，任何外来的“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因素的整合才能产生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趋向，毕竟给“西方中心主义”还占支配地位的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它对于克服长期支配中国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框架及其研究模式，促使美国中国史家转向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根据对历史主体自身的认识，理出中国历史演进中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柯文的中国史观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最大者，恰好与其所批判的“西方中心观”相对应。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新旧社

会结构的替代过程：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社会旧结构的松动、萎缩、解体；另一方面则是工业文明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增长、排挤、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由此，使近代中国的历史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扭结在一起、没落与新生纠缠在一道的多元格局。如果按照“西方中心观”传统与现代对立的理论分析框架，把近代中国的发展归之于西方的“冲击”，就会导致对传统文化复杂性和发展力估计不足，忽视中国传统的内涵，抹煞中国历史的主体性。但如果按照柯文主张的“中国中心观”，突出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忽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实际。这种历史的复杂性要求史家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和“合力”所推动的，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任何只持“西方中心”或只持“中国中心”的观念，都是片面的。对此，巴勒克·拉夫曾说过：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8]。(p148)

【参考文献】

[1]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2]Dean C.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73, (3):206.

[3]Joseph Levenson. Liang Ch' I-ch' 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8.

[4]B. Schwartz.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08-110.

[5]柯文.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6]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J]. 历史研究，1996，(6)：95-105.

[7]P.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294-297.

[8]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上一篇文章：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 下一篇文章： 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胡适与俞平伯
- “纪念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 瞿同祖（近代史研究所）
- 杨天石（近代史研究所）
- 蒋大椿（近代史研究所）
- 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
- 朱东安（近代史研究所）
- 虞和平（近代史研究所）
- 闻黎明（近代史研究所）
- 姜涛（近代史研究所）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